

再生

日八十月一年六十三

刊 週

· 期八四一第

社會改造問題的商榷（上）

伍藻池

馬歇爾做國務卿與美對華政策

子敬

從馬氏任國務卿看美國外交

方艾

民族·階級·國家

白旭

黨派與民意

沈正崙

選民的重任

斯鳴譯

制憲歸感錄（二）

莘薇

新聞管制的國家

不移譯

關於否決權用於原子管制

馬歇爾離華聲明全文

中國民主社會黨機關刊物之一

社會改造問題之商榷

(上)

伍藻池

這是六年前的舊作，現在看來，詞句與意見，都有修改的必要。而再生催稿甚急，一時又抽不出空來，重行寫過。這不像樣的文章，公之於世，對於讀者，著者是很抱歉的。

(一) 社會的本質的變遷與時間的關係

我們試撇開一部人類史，自初民社會以迄於我們生存的今日，我們隨處可以發見，有了無窮盡的鬥爭。有的爲着政治自由，有的爲着解放經濟桎梏，有的爲着宗教信仰，有的爲着民族獨立。凡此種種，不管它們演變到如何程度，其犧牲所付之代價重大或輕微，與夫其所鬥爭的場域擴大或狹小。其最大動機與最終的目的，說來十分單純，一言以括之，就是：「**底**」是自我理想生活的實現」而已，此外沒有其他要求的了。

從另一方面來說，爲了實現人類理想生活，在人類思想史的藩籬裏，中外古今，不知有幾多偉大的才人，費盡了他畢生的精力，窮年累月，希企對於這一個問題，給以一個有效的解答。中國聖哲如孔、孟、老、莊，和王安石等；西洋如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陸克、馬克思和拉斯基等。他們所抱的見解，和他們所持的態度。我們試把他們的著作，作一回詳慎的研究，我們馬上自己分明。他們畢生辛勤的努力，到底所希望的是什麼。我們從此，更可以認識，他們不斷地討論與爭辯，刻刻在期待他們底理想具體地現實，亦不過是意圖把社會一切人類生活進展的障礙，根本地予以排除，使個人能够好好生存於平安社會之中，以滿足他的生之慾望。

但時代演變，在社會生命的進程中，每一個階段所形成的情態，自有他的特殊基調。故此，社會生活的需要，各因其時代不同而相異；同時，適應此種需要的方式，不能不因之而發生特殊的變化。

除了以上時間的條件，而爲我們研究社會進化的人所當特別理解之外，還有空間條件，永久在人類面前搖擺着。同一個時代，在地球上某一個方位，其社會的生活需求；和地球上另一個地方，勿論其內質與外形如

何，亦必難絕對一致。例如英國與中國，現在共同生存於二十世紀中，兩國國民社會生活形態，欲求事相同，這是絕不可能的事，稍有常識的人，均所週知的。有時即同一國度之內，因地理上的遙隔，某一地方的人民的生活必需，和另一地方，其間或許有若干相同，而有其若干部分，則很難希望其能够絕無分別。廣東省之與蒙古，即爲其最好的例證。其所以有此種現象的緣故，實由於社會結構因素不同，故其適應生存條件，亦發生如此重大的差異。而國民的社會觀與人生觀，亦呈現其相異的情調。

有了以上兩大條件，以決定人類生存的生活基礎；因此，古今中外的社會學說者，他們所着眼的地方，與乎陳義立說，彼此之間，絕難一致。其實亦絕無可能辦法，以求其一致。蓋因各人觀察的社會對象，客觀條件，互相懸殊，而各個人生活過程因素，左右環境迴旋，亦有其社會客觀性存乎其間。今欲求其各個人的社會學說，互相諸符，憂憂乎其難矣。

(二) 各學派對於良好生活追求所持的見解

雖然，從歷史觀點來說，不管社會本身如何變化；從學理方面來說，不管各學說意見如何紛歧。但其中有一中心問題，在人類思想史的長流中，萬古而不易者。其問題如何？誠如前面所說，良好生活 (Good Life) 之追求是也。中國孔子中庸之道，老莊無爲之說；歐西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與夫其他主義等等。立論管畫縱橫紛錯，陳義管畫新奇巧異；所主張欲達此目的的手段，管畫用議會改革或流血革命；其所憧憬之理想世界，管畫其刻劃如何美麗。淺說一句，他們的最後與最高理想目的，即曰個人良好生活而已。捨此不談，豈還有其他神祕道義哉？

然而，何者爲良好理想生活；生活又如何乃算爲良好？這又成爲最難解決的問題，且亦成爲古今中外學者爭辯最激烈的問題。各學派對此問題的貢獻，均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自完其說。個人主義者，主張政治權威與社會道德，關於社會個人行動，干涉愈急愈佳，這是個人理想的編

的。無政府主義者，對於政府與國家法律，視之如蛇蠍，他們相信，個人自由生活，能達到理想之高潮，祇有個人從生之搖籃，以至死之墳墓，優游自得，生存於自由社會之中。哲言之，人乃有理性動物，他自己能隨時隨地，節制自我一切日常的行爲，政府與法律的存在，最大的功能，祇有東縛個人自由生活的發展。人生最高的理想現實，唯一的企求，最好把所謂什麼政府與法律那種東西，根本排而去之。共產主義所持之見解，固然，勿論在理論上，與革命的手段上，和無政府主義均有很大的差池。共產主義者堅信，在革命過程上最注意的地方，是無產階級專政，祇有在無產階級獨裁之下，各種階級乃能從斯消滅。換言之，社會的階級意識，達到統一性的情境，唯一可能辦法，祇有無產階級專政；同時才能完成共產主義的真正使命。然而，根據共產主義者的解釋，無產階級專政，以維持國家的生存，這不過是革命過程上，一種適應環境的必然手段，而絕不是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苟階級消滅了，國家的命運，亦隨之而滅亡。「在一切生產者自由平等的結合的基礎之上，來重新組織生產的時候，社會便把整個的國家機關擲到最適宜於牠的地方去。——就是要把牠拋擲到古物陳列館中去，與那紡織車，黃銅斧一類的古董一塊陳列起來。」（註一）到了這個時候，與個人的生活，達到自由最高峯的境界。個人以理性自律，在社會之中，互不相侵犯，共同生活。這樣一來，和無政府主義的理想社會和對於國家的態度，有若干相同的地方了。（註二）

轉過來看，唯心論的學者，對於人類社會至善理想生活，他們欲達到此種生活的手段，和我們剛才所說的，似乎完全不同。唯心論者對於現存的國家，抱有絕大的信仰。他們不獨不希望國家到了某一個社會進化階程而滅亡，或以革命手段而消滅牠；而且絕對堅信，人類至善生活之獲得，實有賴於國家，國家實為政治法律的源泉，又為社會個人道德的典範；且為人類最高理性的總表現。個人人格能够完成，自由能够安全，與夫生活慾望能够適應與滿足，個人祇有生存於國家之中，並賴國家之權威，乃能臻此。故此，人類生存一日，國家無論在任何立場，當永久存在，斷不能因社會形態之轉變，而隨之消亡。蓋因個人生存於無政府社會之中，個人生之意義與價值，完全失却，而了無趣味。（註三）這種理論，關於國家權威與個人生活陳說，引起了近代許多政治思想家的嚴酷批評，然而擁護

之者，亦實繁有徒，其勢力影響於近世人類政治生活，至為深遠。

（三）改造人類社會生活我們所持的觀點

以上所陳，我們將各學派關於良好生活獲得的手段與過程，和我們對此問題的認識與詮釋，作一簡略的概述。但他們的貢獻似乎祇從客觀現象與物質條件之下，來估量人生價值與人類生活的需要，而給予以相當可能的解決。至於人類心理生理種種活動問題，其於人類行爲，有深切關係者，似少加以慎密觀察，而求其解決之方。故此，我們認為人類現在與未來社會，所有社會，政治，經濟，與道德種種組織，實有改弦更張之必要，而後人類生活，方能達到良善優美的彼岸。這是很自然的事實，亦是我們皆知的事實。然而現存的社會哲學，似乎未能負上改造現在與未來社會的責任。蓋人類社會改進，指導其在革命程路上推動其前進，必然需要一種正確的社會思想。而這種思想，必須認識清楚現存社會的缺憾，加以精密的分析，指陳出其所以有如此種缺憾的原因；同時，並創造新的社會思想，以為建設新的社會底南針，而給牠以健全和合理的需要。這是我們現在從事着手的工作，亦是我們生存今日不能迴避的重天責任——改造社會的責任。

改造社會組織，使之以適應人類的生之慾求，第一件而又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使人性(Human Nature)能够自由解放，與實現客觀社會，互相諧和，不致衝突。蓋因現存的人類社會，牠的本身組織，多忽略了人性活動(Activity)，而卻太過重視因襲道德的信仰，或迷於已往社會哲學(Social Philosophy)的偏見。致使個人生活的活力，當為社會的因襲勢力所桎梏，而沒有自由活躍的可能。因此，個人生活，常常感覺到極度的苦惱與無聊；人類社會本身進步，亦因之而凝滯，呈現頹唐之態。即以十九世紀以前之歐美社會改革思想家與政治學說來說，他們對於這問題，亦很少加以討論。間有三幾輩思想家，偶爾涉及；惟很少認為是一個重大的問題，給予以有系統的陳述。自白智達(Bagehot)的物理與政治(Physics and Politics 1873)一書公表於世以還，近數十年間，才引起許多思想家的注意，加以相當的研究。同時，心理學亦跟着時代激變的新流，獨自成爲一種科學，更給予人類以一種新的觀感。而凡研究社會科學者，亦如已

往哲學家一般，認識了人性對於人類個人與社會的行為，其互相關係，甚為密切。這種趨勢，誠為社會科學一大進步。（註四）

故此，我們現在社會組織的改造，和已往的社會改革思想家的學說，持論各自不同。我們不作幽玄的推斷，虛構樓台；我們也不是專從事社會組織外形如何改造，大費筆墨，互競辭鋒，以爭一點一滴之長短。我們最注意的前提，是以客觀的態度，來分析現在社會本質，而追求其所以不十分適應個人生活的原因，並指出其缺憾的所在。這是一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我們說明人類本性與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關係底重要性，而設法使實現社會的組織，如人性活動以最大可能自由領域，以適應人類需求的必然需要，不致令個人失了生命創造的活力，因之，社會時時表現膠着的狀態。如是一來，個人與社會，不是對立的，而是諧和的；不是各在生之途上，分道奔馳，而是共同推動於進步洪流之中，以追逐彼此生命活力的開展。去完成自由生活的最高使命。

（四）本能衝動的 기본形態

關於社會組織問題，我們下面再談。我們在此先行討論的，是人性問題。我們這樣討論，或許有人發生多少懷疑，說這個辦法，不十分妥當。他們的看法，以為社會是「大我」，個人是「小我」而已。人性是屬於「小我」的，今先置大的問題而不論，而卻從小處着手，這是重小而輕大。如此說去，或許有他們的理由。但我們着眼方位，似乎在此而不在于彼。故此，我們未進而詳細討論人性問題之先，實有費若干時間，說明我們所以如此之必要。

人是社會動物，這是事實；社會由個人相合而成，這也是事實。社會之好壞，和個人之日常生活行為，有密切的關係。社會之基礎是個人，有個人之心理，經濟，與政治等等生活，發生變化時，社會本身亦隨之而發生變化。不然，社會必發生革命，而毀滅其自身，從新產生新的形態，以適應個人生活之要求。這乃是普遍的定則。個人的生之活動，常受支配於其本能 (Instinct)。個人本能的強弱，關係於個人的生活力之大小；同時，生活之苦悶與快樂，則完全視乎本能能否受到良好之適應以為斷。社會本質之善惡，固然與個人本能有密切相關；即社會本身之價值，其主要判斷

之標準，亦莫不繫乎此。

人類的行為，從心理與生理上來觀察，實由於本能活動而產生。簡單分析起來，人類本能能與人類社會有相當影響的，大約可分之為兩種：（一）是慾望 (Desire)。（二）是衝動 (Impulse)。人類行為，其由慾望產生的，則很容易為人所知道，人類慾望之滿足與否，則視乎個人希企獲得之物，能否達到其目的以為準。而個人的快樂或痛苦，亦由此而判斷。慾望本身有時間性，且有顯然意識的表示。意欲獲得某一件東西，在一個時期可使人快樂，在另一個時期，則不發生苦樂的感覺。有時某一個人慾望的東西，絕非他本人之能力所可達到，因是，終他一生之年，他這種慾望，卒至無由解決。意志 (Will) 的活動，對於個人無限制與非理性的慾望，給以相當制裁。古往今來的政治哲學，都把擺在這兩個問題，以為理論開展的基礎。換言之，政治哲學的最大對象，是怎樣才能解決人類的生之意志，引導之而與實現社會互相諧調。

但慾望之支配人類行動，祇不過是一部分而已；且此部分是顯明的，却不是最重要的。左右人類生命活動的進程，其基本的動力，不是慾望，而是生之衝動 (Instinct)。狗吠明男，小孩狂叫亂走，與成年人為愛情而犧牲，凡此種行為，從理性方面而言，絕沒有若何重大的意義與價值。然此皆由衝動而生，他們作此舉動，亦絕沒有若何種利益與特殊希望，存乎心中，而後為此。飲，食，男女之慾，與人爭論，和自誇等等人類舉動，究其實，舉動的本身，沒有任何用意，其所以自然有此動作者，全由衝動以驅使之。

有許多人相信，人是有理性的動物 (Rational Animal)。他有時自己向人面前自誇，其最大目的，是希望他人給他以相當的敬重，或博得若干好評。但我們對於「自誇」那種行為，所得來的觀感却是相反的。我們如果的確知道某人所說的話，是自誇了，我們發生蔑視的感情，對他絕不尊敬。在人類自然社會中，某種本能的行為，完全出之於衝動，或者得到他人的重視，而認這種動作是好的。在今日我們生存於社會，強烈的衝動奔放，每每造出一種使有理性的人難以容忍的行為。有許多成年人，在他的生命長流中，他的日常動作，常為衝動所左右，而他却不自覺，自以為他比狗或小孩為較有理性，這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人們為了某一種需求，明知這種行為，是不十分妥當的。可是他却曲為優容他的衝動，以逃避痛苦之光臨。這麼一來，個人的遠見 (Fore-sight) 與衝動，馬上發生直接的衝突。若果衝動是弱的，遠見自然可以把他克服過來，這種動作，我們視之為合於理性。若果衝動太強了，遠見馬上失了功能，一任衝動自由動作，不管其所造成之結果如何，完全予以容忍，根據人類常識來說，這是不合理的。（未完）

馬歇爾做國務卿與美國今後對華政策

子敬

馬歇爾將軍於一月八日晨飛離南京返美，接着華盛頓發表國務卿貝爾納斯辭職，以馬歇爾繼任。同時，我們又讀到了馬歇爾發表的對華聲明。這不但是美國的一個重要變動，而且是世界上的一件大新聞，作者擬把個人的觀察拉雜寫在下面。

一、馬歇爾簡史及其為人

先論馬歇爾本人。他是今日美國七個五星上將之一。他的得到今日的地位，是由於他的慎重，誠懇，切實。他第一次被人賞識是在菲列賓舉行馬尼刺防守演習時，他當時雖地位很低，但對於馬尼刺的如何防守，比他的上司還要清楚得多。第一次大戰時，曾於二週內在法國調運六十萬人，而未有損失，遂為潘興將軍所器重，稱他為第一次大戰中最好的軍官。希特拉進攻波蘭時，他做參謀總長，自一九四一年美國被捲入戰爭後，他就在盟軍聯合參謀總部中，負起指揮全球性的作戰策略的責任。在歷史上，可以說沒有一個將軍曾經打過像馬歇爾這樣的全體性的和世界性的戰爭。美國人民對他的崇敬，非言語所可形容。有一位觀察家會說，「如果馬歇爾不好，則只有由上帝來幫助美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年老退休，但不數日奉杜魯門總統電召出任駐華特使。在中國奔走和平統一的情形，因為是我們大家所熟悉的，所以不再贅述。他雖

是一個職業軍人，但對民主政治的信仰甚為堅定。

二、馬歇爾出任國務卿的原因

原因

從表面上看，貝爾納斯的辭職，是爲了尊重醫生的勸告，所謂「必須休養」，據白宮所發表的貝爾納斯致杜魯門總統的兩封信，我們知道，貝氏於四月十六日就曾提出辭呈，表示願於巴黎外長會議與和平會議後的七月一日去職，旋以訂立五和約工作未完成，故仍願繼續擔任國務卿。但從底蘊裏講，據說貝爾納斯的身體，較半年前還要孱弱，所以所謂「必須休養」的理由，並不十分充足，那末，我們惟有從美國國內和國際形勢兩方面去找答案了。

我們知道，美國議會現在既由共和黨控制，民主黨的杜魯門政府，勢必要受到共和黨牽制，杜魯門亦何嘗不可運用否決權，以回敬共和黨控制的議會，但如此之下，顯必產生一事無成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之下，惟有請出一位像馬歇爾這樣有名望的人物來鎮壓。民主黨的厄運，亦可以此挽回，以便在明年大選時，重振旗鼓。如果共和黨請出麥克阿瑟爲總統候選人，民主黨也可以馬歇爾去對擋。

貝爾納斯實行的兩黨外交政策，僅限於歐洲

問題，自共和黨在議會握得控制權後，勢必要擴充其範圍，而共和黨人物如范登堡，更將炙手可熱。在這種情況之下，亦惟有請出像馬歇爾這樣的人物來鎮壓。

大戰結束以後，美國由於担任戰敗國的佔領與管制，許多執行外交政策的工作落在軍人手中。國務院與軍部之間，遂時時產生了許多磨擦。例如駐日統帥麥克阿瑟是否事事尊重國務院的決策，實是一個疑問。又例如貝爾納斯就不贊成駐德佔領區長官克萊中將的主張，將軍事管理立即交給行政管理。假使馬歇爾出來做國務卿，就比較容易解決了，因為他本人是軍人，麥克阿瑟等不能不承認他的感覺與地位。

從國際形勢講，五附庸國和約已定於二月十日簽字，可以說已經獲致完全協議，而後的問題將更是重要，三月十日召開莫斯科會議，即將展開訂立德奧和約的工作。主持此項工作的國務卿亦應該熟悉問題內情的人，而馬歇爾與貝爾納斯比較起來，就更为適當。因爲馬歇爾曾參與過大西洋會議，卡薩布蘭加會議，開羅會議，德里蘭會議，克里米亞會議與波茨坦會議，一切有關的問題，他都深通熟悉。除德奧問題以外，尚有日本，朝鮮，太平洋代管島與中國問題。而這一切重要問題，美國要謀得協議的對手，無疑的是蘇聯，而每一次與蘇聯有關的會議，都有馬歇爾參加，換句話說，蘇聯對馬歇爾是比較有好印象

民族·階級·國家

白旭

假如一個國家代表一個民族的利益，我們對於這一個國家的形式姑名之曰民族的縱斷的形式。假如一個國家代表一個階級的利益，我們對於這一個國家的形式姑名之曰階級的橫斷的形式。自國家對民族和階級而言，國家是一個虛名，牠可能代表一個階級，也可能代表一個民族。

有民族，有民族便有民族意識，有階級，有階級當然也有階級意識。

在一個民族裏可以有許多階級，如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既有許多階級，每一個階級有牠的特殊利益，有牠特殊的階級意識。結果，必然的，要互相衝突。往往某一階級的利益和幸福正建築在另一階級的悲哀之上。一個「民族的縱斷的形式」的國家可能對於某一個階級照顧得多，對於另一個階級照顧得少。但無論得到如何程度，總能代表這個階級一點利益。

我們根據近代的历史，認為民族的意識，無論如何，總強過階級的意識，這似乎是一件無可爭辯的事實。這便證明了，無論如何，民族的利益應該在階級的利益之上。在整個民族的利益受到損害的時候，被損害的不是這個民族裏的某一個階級，而是這個民族裏所有的階級，原本陷於悲慘命運的階級

這時候祇有更悲慘。

經過了這一次的世界戰爭，中國人如果還不能清楚地把握這一條真理，那便算白犧牲了無限優秀兒女英雄的英勇的血，中國人便不能算是一種有智慧的人。

我們絕不像一般人完全抹殺階級的存在，或者說悲慘的階級應當安於牠悲慘的命運。這一種人是非愚則謬。我們認為天下事，「有不能變為無，無也不能變為有」。有階級，便有代表階級利益的政黨。代表某一階級的利益而奮鬥的政黨，為某一階級的利益而奮鬥，這是天經地義。但是應該有一個限度，不得因謀某一階級的利益而損害到整個民族的利益。不特在道義上不應該，即使在利害的打算上也不應該。因為當整個民族的利益受到損害的時候，大家都有分。

蘇聯雖公認為是一個「階級的橫斷的形式」的國家，但她所實行的依然是民族化的社會主義。民族的形式高於一切，是一件無可爭辯的事實，是一條不用證明的真理。我們希望政府和中共回憶抗日戰事初起時那一種「共赴國難」的精神，恢復當年清明的理智。少逞意氣，相忍為國。拿眼前的情況來說，國家的地位低落了，民族的尊嚴墮失了，蒙其利者誰歟？

，至少馬歇爾是邱吉爾反對開闢第二戰場與反對紅軍進入柏林的反對者。至於對中國，他住了一年多，當然更有深刻的了解。

三、美國今後對華政策

最後，我們不妨推測馬歇爾上台後的美國今後對華政策。馬歇爾希望由他的調停，而使中國和平統一民主，但他沒有完全完成他的使命，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但平心靜氣而論，我們不能否認，他的態度是誠懇的，判斷的正確，以及他不辭辛勞的努力。至於說：他偏袒國民黨，事實上亦未見得如此。因為他對於國民黨中反動份子及若干跋扈軍人的深痛惡絕，是衆所周知的事。他對於蔣主席本人，是願意支持的，他至少假定蔣主席能控制他屬下的反動份子和跋扈軍人，聯合其他黨派的民主前進份子，不斷改革政治，使中國向民主憲政邁進。他并寄希望於共產黨中的溫和派，但對共產黨中的極端份子，他的嫌惡不下於國民黨中的反動份子。

他的對華聲明，不能不說是中國目前病狀的正確診斷書。他做國務卿後，當然更能以他的判斷來指導美國今後的對華政策。

至於說，美國今後對華政策，將起本質上的變更，我們實不敢貿然下這一個結論。但至少在工作上將因馬歇爾的上台而有所變更。

中國問題的解決，還是要靠我們中國自己。國民黨中的反動份子與共產黨中的極端份子，如果繼續這樣堅持下去，則中國前途只有長期內戰。但要他們覺悟，那老實說，祇有民主前進溫和份子的抬頭起來。

從馬歇爾出任國務卿看美國的外交政策

方 艾

美國第八十屆新國會開幕，駐華特使馬歇爾被任命為國務卿，美國國務院這種人事的更迭，一般政治觀察家認為這是美國外交政策趨向右傾的徵候。從華盛頓透露的消息：「馬歇爾調任國務卿，貝爾納斯的外交政策（按：應該說是范登堡的外交政策——筆者）仍必被繼續推行，對蘇聯亦必保持已往的堅定方針。」（見聯合社八日電）

同時，巴黎政界人士指出：「馬歇爾之出任國務卿，旨在「企圖整地貝爾納斯任內美蘇兩國之緊張情勢。」（見法國新聞社九日電）。之外，倫敦外交界人士亦稱：「馬歇爾繼貝爾納斯之後，出任國務卿，殆可視為美國外交政策將趨向右傾。」（見合衆社八日電）

我們根據以上電訊的資料，還無法具體解答貝爾納斯為甚麼下台？馬歇爾為甚麼上台？其原因何在呢？

第一，應該指出的是：從一九四六年初開始，貝爾納斯所執行的美國外交政策，在運用上是以前蘇聯的對蘇聯底強硬態度出現。在這一期間，從倫敦聯合國大會以至巴黎廿一國和會，美國對蘇聯總是在進攻，而蘇聯總是在反擊，兩國在國際政治戰場上的鬥爭達到了白熱化。鬥爭的結局，蘇聯扭轉了戰局，把握了主動權。儘管貝爾納斯出動所有的鬥爭工具，如：金元外交、原子彈武器、威脅論調、謠言攻勢等都沒有屈服蘇聯。最後，蘇聯在聯合國大會以及四國外長會議中佔

了上風，貝爾納斯打了敗仗。美國孤立派英雄們是不認輸的，他們還要佈置陣勢，再接再厲的戰鬥下去，不過戰鬥的方式是要變換一下，指揮戰鬥的統帥，也就不能不變換了。這是貝爾納斯下台和馬歇爾上台的重要原因。

證之華盛頓所透露的消息，愈加明瞭。法國新聞社這樣報導說：

「此間外交界人士相信：貝爾納斯辭職的原因，殊為美國將改變其對蘇政策的標誌；但美國外交政策仍不致放棄其「審慎與堅定」的基本原則，亦不致更趨強硬或精緻。就是說，它的本質不變，祇是在程度上略有修改而已。過去，貝爾納斯以為對蘇政策，如能維持巴黎和會時的態度，則美蘇兩國意見上的基本不同，可能逐漸消滅；以進退有方的拖延戰略來達成美國的目的。但實際，貝爾納斯的這種戰略是失敗了的。聞馬歇爾今後將另換戰略，他的方法，在使雙方能够離開自己手裏的牌，完全放棄貝爾納斯所採取的針刺策略。」（見法國新聞社九日電）

從這段消息看，對美國國務卿之更迭的內幕，可以明瞭大半了。所以德國「新聞快報」（在蘇軍佔領區出版的日報）對馬歇爾之被任國務卿斯論說：「馬歇爾元帥為人無論在意見與政策方面，都較貝爾納斯更為圓轉。」

第二，應該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美國，它的基本外交政策是統治世界的領導政

策。過去一年間，貝爾納斯在國際政治戰場上的角鬥，沒有能够勝任愉快，達成他的任務，纔下了台。這個任務是要由馬歇爾來祖當了，因為它是個艱鉅的任務！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局勢是英美集團與蘇聯集團的對立鬥爭，前者——特別是美國——要領導世界，後者則要爭取國際和平。一九四六年間的國際會議，兩大集團舌劍唇劍所激戰的，無非是為了達成各自的目的。在鬥爭的總結，蘇聯集團是勝利了。這首先是紐約四國外長會議通過了爭執很久的「五國和約」，最後完成了它的審核工作，從而結束了戰後歐洲不正常的狀態，調整了英美蘇三國對歐洲新生國家的政策。其次，聯合國大會通過了裁軍決議案，通過了各國召回駐西班牙使節等決定——這些，都是根絕法西斯殘餘保障世界和平以及制止新的侵略的神聖工作。這些工作主要是由蘇聯鬥爭完成的，因而使美國孤立派英雄們打擊蘇聯與破壞世界和平的陰謀破滅了。

美國孤立派認為這是美國外交的失敗。杜魯門政府為着挽救它在國內外失墜的聲音，不能不希望從一九四七年的外交站場上打一次勝仗。因為三月十日的莫斯科四國外長會議就在目前，在這次會議席上所要討論的主要是對德和約以及對奧和約問題，它比任何問題都重要，而德奧和約的締結比「五國和約」要困難得多，蓋戰後的

歐洲問題是複雜紛繁的，就中頂繁雜的問題，是德國問題，德國問題如不能獲得澈底解決，那麼整個歐洲問題就不能說是澈底解決。

然而，美國所希望德國問題之解決，與蘇聯所希望的，又不相同，原因是：美國要擴大它的勢力到歐洲，伸張它的托拉斯網。這樣，它首先就要扶植德國的獨占資本巨頭——法西斯的根株——從而樹立美國對歐洲的政策。而蘇聯所希望的則是嚴格執行「波茨坦三國公告」的決議，澈底消滅法西斯的根株，從而扶植德國的民主力量。怎樣解決德國問題呢？是未來的四國外長會議的繁雜而艱鉅的任務。以這樣的繁雜而艱鉅的任務，顯然不是貝爾納斯所能担当，杜魯門政府要在這次外交中致勝，所以纔選上了馬歇爾。

第三，九日華盛頓電稱：二月下旬馬歇爾赴莫斯科將出席四國外長會議。在出席四國外長會議之前，須向國會申述其外交政策。參院外交委員會暗示該會將對馬歇爾詢問包括極大範圍的各項外交問題。而有力的參議員力稱：參院之所以迅速通過馬歇爾出任國務卿，並不是毫無保留，他們甚望聽取馬歇爾對世界各種問題的見解。而范登堡則要求馬歇爾在出席四國外長會議以前，先與參院外交委員會舉行若干次會議。據聯合社的報導：當參議院全體一致批准調任馬歇爾的國務卿時，共和與民主兩黨即表明繼續推行兩黨一致的外交政策，而不受政爭的影響。

這兒所指的兩黨一致不變的外交政策，歸根結綫說，是范登堡的外交政策。儘管它實質一成不變，但在國際形勢轉換期中，執行美國的外交政策，其運用的手段和作風，是不能不變的。

首先是妥協和對蘇的關係，換句話說，美國在解決一般的國際問題時，不能不重視蘇聯的意見，因為今天蘇聯在爭取世界民主和平鬥爭中，已經起了中堅的作用，形成爲保衛世界民主和平的堡壘，這種堡壘正爲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所捍衛。正因爲這樣，過去貝爾納斯和作風的人民所捍衛。特加就德國問題所發表推銷「波茨坦三國公告」的決定，以及反蘇的強硬外交政策，無疑的是走不通的。

因此，美國國務院爲了適應這一個新形勢，不能不有新的做法，對蘇聯一定要放棄「針刺」的策略，而改用「軟和」的策略。這是美國戰後政策進入新階段的開始。

第四，應該指出的：經過這次世界大戰，在美國產生了軍人勢力，最著者爲麥克阿瑟，李海，魏德邁以及馬歇爾等，他們在對美國外交政策上有了發言權，形成了國務院與陸軍部（也包括海軍部）的對立。今番馬歇爾之被任命爲國務卿，此舉可使兩方的對立化而爲一，減少它們之間的摩擦。

但是，美國外交政策今後將更爲軍人所控制，而美國以軍人出掌國務院，以馬歇爾爲第一人，一些政治觀察家之所以指出美國外交政策右傾，是由於軍人長外交的原故吧！

之外，由於美國軍人勢力的形成，軍人的抬頭，這種勢力與美國的巨大獨占資本結合起來，美國的外交政策勢必趨於右傾，這可以逆料的。然而，由於美國的這種勢力在增大着，也警醒了美國進步的人民，在美國已經存在着「一百九十八個民衆團體，最重要的則是產業職工大會的「政治行動委員會」，以及「爭取和平委員會」，它們正在保衛美國的民主傳統，跟反動的勢力進行鬥爭。

制憲歸感錄(二) 萃菽

或又問當局推行憲法有無誠意？余謂此不必問，觀於制憲時情形，即已知之。此次國府所提憲草，爲政協原案，各黨各派，乃至無黨無派社會賢達，無不擁護，而中少有波折，乃出諸國民黨員之手。初來勢極強，幾欲推翻政協原案，恢復五五憲草，而又過之。幸當局以極大膽力，通過組織部，約束國民黨一部份黨員，始克漸清就範。然至三續之際，仍有人指手畫腳大聲疾呼。政身爲主席之於海翁則付爲難。卒賴蔣公一言，遂獲冰解。由是以觀，可知當局對於制憲實有十二分誠意。何則？欲求一內政外交之對策不能不有一部比較民主的憲法，欲制定一部比較民主的憲法，不能不有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人士之參加。政協原案，原爲各黨各派無黨無派乃至共產黨代表所草擬。故擁護政協原案，不啻促成民主政治，促成民主政治，即所以解決當前之內政外交問題也。當局不以民主憲法爲滿足，必欲求一比較民主之政府，以負行憲之責任，此比較民主之政府無他，即政協決議中所謂聯合政府是也。故今日當局欲求各黨各派無黨無派之參加政府，容更迫切於參加國大之時。何則？非有比較民主之政府，實難負責施憲政之責任也。由是可知當局非獲各黨各派之參加，不能組織一比較民主之政府，無一比較民主之政府，則憲法之實施不免荆棘滿途，語云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明者見於未形，誠意云乎哉。

選民的重任

Harold W. Dodds
斯鳴譯

本文譯自「紐約時報雜誌」，為普林斯登大學校長鐸治 (Harold W. Dodds) 氏所作。全篇引伸英國名政論家蒲萊士 (James Bryce) 所謂「良好公民的三大障礙」之義而成，但氏獨以做一良好公民，不僅為個人在道德上應盡之義務，而政治制度亦應與有責。彼謂「選民必須了解其政府，然後始知政府有我一部份在。唯知有我一份在，然後始能控制政府。唯能控制政府，然後始有民主政治可言。」斯言也，實為本文全篇主旨所在。在政治學上，詢可謂繼約翰彌勒 (John Stuart Mill) 及蒲萊士之後，為對公民在民主政體中之任務一大闡發。通篇雖藉以美國為立論對象，但其對於民主政治之呼喚不出來之中國，亦頗足為借鏡之資。爰逐譯之，以餉國人。

——譯者附識。

四十年前，蒲萊士曾在耶魯大學發表一連串的演說，這些演說後來都在「良好公民之障礙」(Hindrances To Good Citizenship) 的標題下出版了。在這幾篇演說中，他指出民主政體所要求於公民的理論，與民主政體所表現於實際方面的，有什麼習見的歧異。沒有一種其他的政體，需要人民具有高度智慧，公德心及全民道德，有如民主政體者。可是他說，民主政體却到處沒有實現其期望。

他所描述的民主政體所以未能成功的第一個障礙，乃為偷懶的罪惡。他說這種罪惡，係由於人民自身對於公共問題及投票選舉不加理睬，以及對公家職位不願服務所造成。這種漠不關心的神情，恰與真正民主政體的基本大前提，需要人人都必須是「其國家的一位活動的，發號施令的，以及聰明的統治者」背道而馳。

良好公民的第二個障礙，厥為自私自利。其最無知者，當莫過於選民與官吏的賄賂公行。罪惡較不昭著而危險相同的，乃為經濟團體的勢力，為了目私自利的緣故而左右政府。蒲萊士說，受私利無限支配的人數，

在數目上雖不多，但在政治上却很重要。他們從來不睡覺，而在危險的騷密中進行。

第三個障礙為黨派的意氣。蒲萊士說，「當一人真為黨派的意氣所中，他便祇知忠於其黨而不知忠於國了。」蒲萊士對於政黨性質或功能，並不是愚昧的空想家。他承認政黨政府始終還是唯一的方法，使民主政體藉以保持強大，並使某一組利益與別組利益之間，不致失去平衡。

蒲萊士所指摘的乃為黨派意氣的過度濫用，而並非難其合理的表現。不過，蒲萊士會說，當着不願真理只顧勝利成爲一個政治集團的主要動力時，則民主政體便受到致命的創傷了，旨哉言歎。

自從蒲萊士寫了那本書以後，民主國人民對其政府的態度，已有顯著的轉變。姑不管民主政體是否變質多樣，但一般人民對其政府，却比以前更爲信任了。他們願意給與政府的權力，確遠較四十年前所擬給與者爲大。政府權擴張之迅速與戲劇化，會使很少人肯停下來想一想，強大政府所能影響於公民在一種民主政體中的任務爲如何。

一般普通的公民，對於今日政治問題的了解，有無向常的充分？真正坐在駕御者的位上的究竟是誰，是民或是官吏？除非一般公民對於政治問題的了解，能隨其日趨繁複而俱增，否則對於一般官吏，是否會命定地失掉控制？假使人民對官吏失掉控制，則民主政體將發生什麼影響？假使強大的政府改變了選民在我們政治制度上的基本地位，則我們的民主政體還能長此站得住否？這些都是基本的問題。

權力擴大的政府究竟是好是壞，非我現在所擬論列。這是一個普及世界的動向，無論民主獨裁都是一樣，它具有兩者的成份。我現在所要強調指出的，乃爲某些威脅我們團體政治的危險，必須要加以診斷與防止。

請先言偷懶的罪惡。假使在三四十年前已很難教一般天生懶惰的選民（此中包括大多數的我們在內），對政治問題求得充分的了解，則時至今日，公共問題的複雜，遠較一般勞動經濟學家，農村經濟學家，貨幣經濟學家，國外貿易經濟學家及其他類似的專家，紛紛起來弄得我們目迷五色以前的快樂時代爲甚，那末，欲求一般選民再去了解，其困難更屬如何？

這不單是一個選民懶惰的道德問題，它並牽涉到他們的權力問題，他

們唯曰孜孜，必須為生活而工作，焉有餘力了解五花八門的公共問題。我們不能要求選民去做不可能的事。故民主政府能否在日益增大的政治權力中進行，而不致使一般人民，為了贊成領袖的原則，不知不覺地放棄了他們混亂與精神渙散的合理化，那才是一個實在存在的問題。

除非選民覺得他能了解其政府，他決不能具有一種政府我也有份的感。除非他具有一種我們有份在的感覺，他決不能控制政府。除非他能控制政府，否則決無民主可言。

其次談到自私自利，我們也有同樣的疑慮。我們可以同意自私自利在政治上始終是個惡勢力，但是我們現在能否像蒲萊士一樣的確實斷言，以為政治上受其支配的人數或勢力還並不多？今日這種團體的勢力與影響，較諸蒲萊士所想像的，不是更為廣大嗎？國家活動的範圍愈廣，則選民為其私囊打算而工作及投票的動機也愈大。

改革家們往往對於昔日的江河海浩經費案大肆非難，以其曾吸收納稅人的金錢，用於開濬暗流，而使國會議員獲選。同樣的，我們的保護關稅的歷史，也曾是私利的長期鬥爭史。可是比較現代式的政府，其對於特殊利益的補助，諸如維持物價的計畫，以合法的命令規定工資，或政府對銀、糖、棉花或穀物的津貼，其流弊怎樣？所有這些計畫，都有利於政治組成的團體。現在日趨流行的直接行動的新方法，即所謂政治罷工又怎樣？姑不管其在人道方面如何，但這種政策與實際，不是提供了新的機會與強烈的誘惑，使其在精神上等於賄賂選民嗎？

命令強大的政府，確為適應現代環境所需求，但公共費用與政府津貼涉及選民有如今日之廣時，則政治上之弊端即潛伏於是。當然，我們往往也有若干壓力的團體，但是它們從未有如今日那樣的實在，或從整個看來，有如今日那樣的組織嚴密和有力。

蒲萊士所說的最後一種障礙為黨派的意氣。正如每一學生所週知，我們憲法的創始人，嘗把政黨與「好結黨之風」混為一談。幸得我們基本的政治意識，保全我們不致吃這班名人們所預示的凶兆之虧。我們現在的政黨，尚未真正演變到如歐洲大陸上破壞議會政治的那種黨派林立的地步。不過，過去雖則如此，我們對於將來這班人的肯定嗎？將來小黨派林立之風，能代替舊黨派的意氣而出現，卒成為良好政府的嚴重的威脅？

壓力的團體為擴大政府活動之因，同時亦為其果。政府抄近路對壓力團體效忠，而不效忠於政黨，則政黨的責任必致趨於分崩離析了。壓力團體組織堅強，其黨徒都較願於接受其領袖的紀律，並順隨之而趨，決非站在「團體」之外的政黨後台老板所企及。這種領袖之變成日益得勢，為舊式的政黨領袖向所未有，因其擁有一種靠得住和有提防的私利為中心，其團體即循是而組織起來。

了解這種自覺的羣衆，組成了壓力的團體係適應一種與古典的民主政體的政治領袖大異其趣的新式領袖而來，那是很重要的。壓力團體的領袖，敢於為其自身，要求一個政黨領袖所求之不得的較多的行動的自由，他並且得到這種自由，因為其團體中的份子，覺得他是滿足他們的特殊利益的。

我不是一個對選民道德與智慧的進步已絕絕望的人。政治固然是一種極遲鈍的事業，但假使一般選民在其公共事務的運用上，都能盡其極大的勤勞，完全捐除了私利，對黨派的熱情又能以冷靜的客觀出之，則我們的憂慮即可烟消雲散了。

可是人類總是冥頑不靈，既不肯變成極端良善，又不肯變成絕頂聰明。（謝謝上帝，他們同時也不肯變成窮凶極惡。）所以任何一種民主的政府，都必須建築在這種公民智慧與道德額量的基礎上面，這種智慧與道德，乃為自然所賦予，并可得而培養發達之。這意思是說，我們必須注意，我們政府的組織是既要負責又要有效，每當新的職權提給它時，其活動範圍便要受一次極嚴格的考驗。

我們必須注意，蒲萊士所說的良好公民的障礙——懶懶，自私自利與黨派意氣——係備有一種極濃厚的道學氣味，而我該是最後一個人，把做一個良好公民，算作個人道德上的義務，分開來另作別論。單是激勵人民具有公民的道德是不够的。我們必須看看我們的政治制度，是鼓勵他或打消他。假使我們需要他做個有力的公民，而不做一個自私自利的參與者，那末，我們尤其要避免犯強人所難的錯誤。

茲因為篇幅所限，僅能提出幾件必須做的事情來討論。一件極迫切的需要，就是我們的政府機構，必須加以澈底的現代化。姑舉一個例子來說，作為立法監督行政機構的議會，必須最先加以澈底的審查。最近改組

新聞管制的國家

賽德懷著不移譯

希臘政府最近花了八萬美元為新聞記者建築了一座特殊的監獄；也許想藉此增加新聞記者的尊嚴。許多編輯與記者受了監禁，最合理的解釋便是他們違反希臘政府的新聞管制法令。

今日從事新聞事業者仍是最危險的職業。譬如在希臘，Georgia 報主筆寫了一篇社評，反對泰馬基(Engine Talmadge)所著種族優越論一文之後，受了一幫武裝暴徒的包圍，結果當面道謝，才能脫圍而出。在 Zaireb 克羅特農民黨機關報主筆馬爾卡太太不過發表一點意見，不為「鐵托」政府所喜，結果該報受了炸彈，無法營業。總算這位太太幸運：印刷機毀壞了，全盤鉛字散在滿地，其餘什物被拋擲街頭，行人皆可目視暴行。其實暴徒們若是聰明點，何如用新聞審查代替炸彈，報紙仍可照常出版，讀者也不會懂得更多。

事實上世界最大多數的讀者都不能懂得更多，全世界人口有百分之六五處於政府各式各樣的新聞管制之下。即使在聯合國國家以內，便有二十個國家經常統制着新聞，不使在國內大量流通。

美國常常想與其他國家分別訂立條約，保證交換新聞的完全自由。但是一談到此事，西班牙等國的大權在握者便溫和地引用一九三二年國際郵電協議第廿六條：對有礙於本國安全的電訊，准許加以審查，合法新聞電訊受其壓制，他們反認為有法理根據。

合法不合法問題，對於有經驗的審查員倒是小事。花樣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在全世界紙荒之時，阿根廷的 Pato 以配給報紙為由，控制了全國大部份報館。為其所喜者給以報紙，其所仇者便予以拒絕。巴爾幹一些國家，或是在巴士斯坦，審查員故意把通訊員的電訊遲延不發，使失去新聞價值。在印度，政府官吏甚至用這種方法處理電傳新聞照片。在南斯拉夫，一個通訊員發了一則不利於「鐵托」政府的電訊後，幾乎不能獲准再度入境。南斯拉夫否認這是審查制度。的確，外國通訊員的電稿並不受審查，南斯拉夫的部長們在海外的消息必定將副本拍回，同時政府當局統制他們僚屬，不使洩露。

新聞通訊員在蘇聯不能出莫斯科一步，當然無新聞可發。西班牙和其他許多國家對於外國通訊員規定一種「責任審查制度」，明白告訴他們：要你自愛，要你對我們客氣，否則請你走開。政府對於友好者可以隨時予以印刷便利，對於反對者也可隨時予以拒絕。編輯們當存戒心，恐受報復。

當此全世界各國都有出版自由之時，南斯拉夫自不能例外，憲法第二十七條即有明文規定。但是全國無一反對派的報紙。米倫克羅爾發行小型報「民主」之時，政府控制的排字業工會竟不肯替他排印，使得克羅爾無法出版。在南斯拉夫，民主黨與激進黨享有出版自由權，但不准他們

計畫雖嫌微弱，尚不失為方向正確的一個步驟。批評美國政治，說其當立法與行政方面都奪大其執行權的幾年間，議會竟毫無作為，以改善其地位，使之成為一個有效力的監督機構，或對行政各部門所創議及制定的立法，作為一個有資格的審查機關，那真是一種妙論。假使議會自身不能有效地做到其為人民所精選的武器，以執行人民的意志，則它除了終為一種行政上的幕僚政治所制外，決無他途可循。

我們的聯邦制度，目前很需要更加檢討與增添活力。公民愈益與政府接近，則他的參與也愈形活躍而有效力。這便需要對真正行使職權的聯邦政府之應否保存，從新予以注意了。

我並不想提出我們對於各州的權利，再來恢復從前的那種徒然無益的辯論，以為各州與中央政府之間，其利益是天生衝突的。不過，這意思倒並不是說，中央政府，各州與地方之間，其職權分配的原則，乃是陳舊無用的。

假使一個具有大陸規模的國家，運用一種真正民主的原則，則我們的州與地方政府，確尚有其價值在，必須予以保留。其間仍有工作待其完成，而現代的術語，也並不要它們沒落到僅僅成為地理上的名詞。事實是一百五十年前所配定的分權，現在已再不能適用了。而依着現代職權的界限指示的新辦法，也無理由廢止聯邦主義的健全的原則。

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討論，不能等閒視作僅僅是政府「機構」的問題。反之，它們却引起了政治學上的重大問題，其間美國人曾經一度對之很感興趣，我們現在也應該重新予以注意。

非議政府的一切政策。他們祇能以打字紙發佈新聞。

新聞自由流通的問題在東西各國皆有瘋狂的爭論。各人有苦說不出。饑饉交迫的亞拉伯人對於新聞審查當然漠不關心。貧困的人民所需要的，是糧食、教育與寬大的房屋，給他們新聞自由，無濟於事。蘇聯人正被驅使着從事於為國家為主義的艱苦工作，難道還有人提倡蘇聯採取西方式的出版自由？

我們似乎有一個中庸之道，可能達到新聞的自由，大致為東西各國所接受。去年春季，新聞記者國際機構在 Copenhagen 召開初次大會，一致同意通過綱領，使負責的出版業享有出版自由

捷克政府依據這種決議開始有意義的試驗。捷克政府在戰爭結束之後，遭過着東南歐洲國家所共有的困難問題。譬如：(一)紙荒，(二)論陷期中，第一流的記者的遇害，(三)發佈新聞與宣傳人才的缺少(尤其影響蘇聯的宣傳)。直到現在，捷克政府處理這些問題，從未妨礙基本的出版自由，也不會引起強國的不滿。

捷克政府設立一種新聞供應委員會一類的機構，以少數的報紙作公平的分配。許可證根據申請者所提供的事業而定。除此以外，政府經國民大會的批准發了一道命令，對於五個政黨和農民團體工會及其他機關，限制許可證的發給。因此在捷克沒有個人或私人團體發行報紙的。在捷克報紙上，很少看到個人的意見。主筆與其所代表集團商討後，才能決定社論的內容。總之，捷

克的報紙是互相合作的。假如任何人要想替報紙寫稿必先經捷克記者同盟會內的專部審查。申請者的教育與道德背景都要一一詢查，然後由該部負責人的多數通過接受或拒絕其申請。當選者須簽名於志願書上，違犯規章，便要受革職處分。捷克記者為「納粹」所害者不下數百人，年青的記者正由新聞專校訓練出來補充。一經畢業，他們可以得到類似「編輯」的名銜，從事工作受法律保護。

捷克報紙忠實於「共同戰綫」同盟的政策，這是一種自願，沒有法律加以強制。雖然捷克共產黨正想驅離國家主義運動，因而以集權主義式的方法管制全國報紙，但是現時的舉措並不妨礙蘇聯與西方國家。這種改良方式的辦法可能對於東西兩鄰的國家有極大的影響。

那些國家婦女有選舉權？

到目前為止，世界各國的婦女還並不是都得到了選舉權。下列表格顯示各國婦女享有選舉權的具體情形：

- 男女選舉權平等的國家
- 阿爾巴尼亞、澳洲、奧地利、巴西、保加保亞、緬甸、加拿大、中國、哥巴、捷克、丹麥、多明尼加、厄瓜多爾、薩爾瓦多、芬蘭、法國、德國、危地馬拉、匈牙利、冰島、印度、越南、愛爾蘭、義大利、日本、盧森堡、墨西哥、荷蘭、紐西蘭、挪威、巴拿馬、菲律賓、波蘭、羅馬尼亞、暹羅、西班牙、瑞典、土耳其、南非聯邦、英國、美國、烏拉圭、蘇聯、委內瑞拉、南斯拉夫。

- 婦女選舉權不平等的國家
- 阿根廷、比利時、玻璃維亞、智利、哥倫比亞、哥斯德黎加、埃及、希臘、海地、宏都拉斯、伊朗、伊拉克、尼加拉瓜、巴拉圭、祕魯、葡萄牙、瑞士、敘利亞、黎巴嫩。

可是更基本的是，我們對於國家的性質，以及對政府最適當的活動範圍，都需要有一種明白淺曉的哲學。某一精銳的觀察家嘗謂，「現在進步份子的工作，最後分析起來，都是依靠官吏權力的增大，以改善人民的環境，幾乎到處皆然。他們的呼聲，往往要求更多的官吏，具有更多的權力，以統聚人民更多的活動。」我們還可以再添上一句，往往有人以為這種統制，賢明而又利他。這種見解是不實在的，因其沒有看到國家本質上所具有的若干重要的常數。

當我們要決定政府對我們的好處究有多少，最好記住這句話，政府一方面固然愈於警察，一方面則尚不及一位公正無私的慈善家。國家之所以異於一切其他類型的團體，即在它具有有一種極重要的因素。它是唯一的機構，有權使用強制力，以執行其意志。國家對於強制力，具有一種法律上與道德上的專利權，憑此事實，便使它一舉一動，都沾染了強制的色彩。正唯國家是強制力的化身，故每當有人建議擴大其權力，便又引起我們有重行檢討我所會討論的公民的缺陷與限度的必要。

我們必須小心謹慎，不要把我們的社會太過政治化了。祇要人生的大部份仍還有我們個人隨意行動與決定的餘地，那我們才尚有自由可言。我們私人所應作的決定，或我們所應隨意應行的社會義務，若都交給與政府，則我們的自由將不克保完。就個人論，我們係與政府同受一種連帶的強制，提供個人所能建立的幸福生活的基礎。

關於否決權用於原子管制美蘇兩方態度

一·巴魯樞聲明全文

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代表巴魯樞二十九日向委會執行小組會發表有力之聲明，力言美國維持堅強之立場，反對利用任何否決權以阻止國際管制原子能之實行。巴魯樞之聲明全文如下：「本委員會美國代表團對於一般所謂安理會否決權之立場，雖有不少解釋，但余恐仍未能使人完全明白。吾人並未攻擊憲章內所規定之安理會否決權，吾人亦不擬攻擊之。余如有權修正此項否決權，余甚至亦不欲建議即於此時修正之。○行動一致性之原則與○自願放棄所謂次要或繼續性之否決權，彼此顯然不同。關於第一點，吾人提議對於現有之安理會程序，勿加以變動；關於第二點，吾人主張不得運用否決權。美國之建議絕不違反大國一致之原則或憲章中所規定否決權之運用。美國之建議僅與否決權極端、微弱與非故意之運用各不相符。所謂否決權問題，在此情形下，有四種事實：第一、當吾人之建議提付安理會之後，為大國所接受，否則將遭夭亡。吾人之建議，除非為各國所接受，否則將遭夭亡。吾人並未攻擊一致性原則之此種健全、適當與故意之運用。第二、安理會通過一種計劃，並擬就一種條約之後，各國均有權自審或用否決權決定是否將加入國際管制之制度。此種否決權亦為吾人所不反對者。第三、當處理國際管制制度之團體成立

後，該團體當可獲得適當之權限，履行其任務。

余以為吾人已同意一致性之原則不應運用於管理團體之活動。第四、如有一國違反協定與條約，則管理之團體應對此事喚起各國及安理會之注意。屆時安理會與簽約國均須起履行條約之義務。關於此點，吾人主張，須約國即不得以否決權作為規避後果之護身符。我國人民相信：聯合國係代表條約之尊嚴及國際關係中諾言之履行，我國人民若相信違約國能逃避其違約之後果，則彼等將撤消其對聯合國之支持。美國之建議完全符合此種立場及聯合國憲章之精神，否則今後一切國際條約將失去其意義。此處之問題在於條約之尊嚴對否決權之尊嚴，余以為誠心守約之國家不致需要否決權，惟蓄意違約之國家，方需要否決權保護。余已言之，如果大國蓄意違約，則任何之莊嚴之協定亦不能防止此種違約，如果大國無權利用否決權以規避其義務，則結果將為戰爭。余同意余相信如能確實明瞭此理實為歷史上趨向和平之最大步驟。凡願意簽署此種條約之國家須明瞭，故意破壞條約者將受懲罰，必要時能引起戰爭。然則吾人當不致輕率違約與規避，此即聯合國之精義，此即憲章序言與目標之精神，採取集團措施以防止及撤除和平之威脅。余不能向美國人民與美國國會建議我國在僅憑一種狡猾手段可能規避懲罰之制度下交出原子戰具，吾人所謂求於諸君者為投票贊成如下之建議：即任何一人

不得以其自己之否決權決定其本人或其友人是非有罪與否應受懲罰。諸位，此為非此即彼的問題，諸君非同意一個罪犯有權投票反對吾人之立場，即投票贊成此種永久和平與普通常識之基本原則。」

二·蘇聯真理報論強國一致原則的問題

國際合作最重要的基礎之一，便是各大強國在解決和平與安全問題時的一致原則。這一原則成為聯合國憲章的基礎，完全是偶然的。某些代表團在聯合國大會上所發動的對這一原則的運動歸於失敗，這也是十分自然的。但是，正因為遵守一般之原則對於保證在平等基礎上的國際合作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它就成為了那些力圖以一個強國或者一羣強國的命令來代替平等的人們攻擊的鵠的了。

某一份份英美的報紙，現在已就原子能管制委員會討論第二小組會根據美國建議所提出的報告草案一事，對一致之原則發動了最近一次的攻擊，委員會中討論得最多的條文，乃是這一建議，即：懲罰違背協議條款者不應應用一致之原則。蘇聯代表葛羅米柯竭力批評這個報告草案。他堅決主張必須修正上述的條文，同時主張除去草案中其它的缺點，使其符合聯合國憲章以及聯合國大會關於普遍減縮軍備的決議。葛羅米柯同時指出：管制與監督的機構必須根據它們自己的規則行使職權。這種規則必須規定以多數票通過決議。因之，使某些「民主」的戰士那裏激動的否決權并不適用於這些管制監督的機構，這是很顯

馬歇爾離華聲明全文

總統最近曾發表過去一年內中國一切發展之綜合報告，以及美國政府對華之立場。目下之環境使余對於此事，應以直接獲得之印象，有所補充。

在本人進行談判以便促成中國和平與民主政府之時期內，若干問題，乃余所認為比較重要者，際此複雜而混亂之局勢中，余僅將述及各該比較重要之問題。

第一，和平最大之障礙，厥為國共兩方彼此完全以猜疑相對。

一方面，政府領袖堅決反對組織共產主義之政府。另一方面，共產黨人則坦率聲明，謂彼等係馬克斯主義者，雖則首先將經由英美型之民主方式政府，但仍企求在中國建立一共產主義之政府。

政府領袖認為：中共願意參加去年一月間政治協商會所規定之政府，此種表示，純出於破壞性之意向。余相信：中共人士深感政府方面並無履行行政協議組織新政府之誠意，中共人士並認為政府且以軍事力量之威脅及秘密警察之行動存心消滅共產黨。除此項濃厚之相互不信任外，國共雙方且有一顯而易見之錯誤，此即忽視在談判中此項懷疑對於對方考慮若干建議或反對理由時

之影響。雙方均斤斤於設法消滅自身之疑懼。因此，雙方對於對方之立場均存偏見，且對每一建議或可能性，均具戒心，遙遠及廣大軍事衝突前線所傳來之混亂新聞，復使此項錯誤愈見深重。斥棄衝突每每故意歪曲為大規模攻勢執行。雙方均利用曲解以中傷對方。余亦只得仍賴執行總部所屬小組中之美籍官員之報導略窺事實真相，而且事件次數極多，所佔之地區亦極廣大，以致美方人士遂有顧此失彼之感。余對美軍及海軍陸戰隊排除極大障礙奪取中國和平之卓越英勇，謹此加以述及。

余以為最近談判決裂最重要之因素如下：在國民政府（實際上亦即國民黨）方面，最有勢力之反動集團對於余促成真正聯合政府之一切努力，幾無不加以反對。此種反對，往往以政治或黨的行動為掩護，但國民黨即是政府，故其行動雖非直接，而其勢殊不可侮，彼等公然坦白宣稱：「中共之合作實為不可想像之事，惟有武力政策方能解決問題。」此一集團包括軍事與政治各領袖。

在中共方面，余相信內有激烈份子亦有自由份子，但有不少人竭力反對此種見解，以為中共黨紀嚴厲，在一黨內決不容有如此不同之觀感。但在余看來，共產黨方面，確有自由份子集團在

然的。然而，不用說，規定給管制與監督機構的程序，并不能擴大應用到安全理事會，安理會是根据聯合國憲章而行使的，可是，第二小組會所準備的報告草案却包含着對聯合國憲章實質的修改。十分明白，這一條文是不足取的。然而，委員會中大多數的委員都投票贊成這個草案。

某些英美的報紙都執行了為該報告所根據的那些錯誤的爭論「辯護」的不值歡迎的任務。這些報紙將自己置於可笑的地位，這是不足為怪的。英國保守黨的「每日電訊晨報」就是如此，它明白表示這個草案的主要任務便是將原子能管制從安全理事會的權限中移開去，這就是剝奪了對普通安全負有主要責任的安理會基本的職權。「曼徹斯特衛報」的立場也是同樣拙劣的，它一方面繼續確信：反對在安理會中應用一致之原則的理由「在邏輯上是無可置辯的」，另一方面却指出制裁違背協議的強國在一般上是不可能的，來對巴魯區計劃的實際性發生懷疑。

這兩個報紙都是從十分可疑的前提出發：它們認為參與關於原子能管制協定的每一強國都是可能的協定的破壞者。其實，我們不應關心這一點，而應該關心確立防止製造，保持以及應用原子武器之可能性的條件。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外國報紙都採取這樣的悲觀的觀點。有許多報紙，特別是美國的，都相信原子的管制問題能够而且一定可以解決，雖然這需要極大的努力。這些問題無疑地是可以解決的。但是，儘管那些反對一致之原則的人們爭論，而邏輯和可資利用的經驗證明：唯有在一致之原則下，才能保證國際合作，尤其是在解決像普通裁軍、禁止原子的武器及其他集體毀滅人類的工具這種重大問題方面的合作。（一月五日）

內，尤其一般青年，彼等因痛恨當地政府之腐敗而傾向共產黨，但彼等重視中國人民之利益，更甚於立即建立共產觀念之魯莽措施。至於真正極端之共產黨徒，則不惜任何激烈之手段以求達到其目的，例如破壞交通，以便破壞中國之經濟而造成有利於推翻政府之局面，至於人民所受之直接痛苦，則在所不計。彼等完全不信任何黨派之領袖，彼等似乎相信，凡政府所提出之建議，無一非用以打倒共產黨者。去年二三月間雖然受人鼓動之羣衆暴動（其中若干次發生之地點離余從事談判之地僅數條之隔）予共產黨以良好之藉口，使其猜疑成爲合理。

中共程序中之極有害及煽動性之階段則爲宣傳文字。余顯告美國人民：此種宣傳已全然不顧真理及事實經過，對吾人政府之政策及意志極盡故意曲解及詆毀之能事，且種種事實均足證明此項宣傳之主要目標欺騙中國及世界人民，激發彼等對美國痛恨心理。對於此項公然詆毀及全然不顧事實之行動，吾人實難保持緘默，然而一次否認後，則非每日均有否認不可，此又爲美國官員員絕難容忍之一工作。秉公言之，國民政府新聞公佈機關雖無中共宣傳之罪惡性質，亦有諸多錯誤之報導。中共對於安平事件所發表之聲明尤其純屬杜撰，安平事件之結果爲海軍陸戰隊士兵死者三名，負傷十二名，此項事件係出自有計劃之埋伏截擊，被襲者爲輸送執行總部供應品及若干聯總物資之海軍陸戰隊運輸隊，中共方面之報導則謂此項事件係由防禦海軍陸戰隊襲擊而起。對於此項事件之調查工作，亦屬故事遲延，以便掩飾此項事件之真實乃私自承認的事實。

雙方之極端份子曾使獲致解決之誠意工作一再挫折。一年前政治協商會所獲致之協議係自由而且遠大之憲章，此項憲章遂爲中國奠定一和平及復興基礎。惟國民黨中之不安協集團，意欲保持其自身對國之封建控制，無不秉承政治協議之誠意，余雖以軍人之姿態現身說法，然而余對軍事之支配力量亦復引以爲憾。軍事之支配力量已使中國政府之力愈益薄弱。同時，詳察中國形勢之人士必須牢記者，並非少數共黨集團或委員會之工作，（此種工作，亦爲我在美國所司空見慣者），而係萬萬人民及一百餘萬軍人之動態。

余從未能確定中共內部態度之演進。最近數月中，中共所追隨之路綫，顯示彼等不願促成公允之妥協，此爲最確定者，即欲促使中共代表與政府代表會談問題，亦屬不可能。中共現已提出最後要求，而使談判中斷。彼等要求解散國民大會並恢復一月十三日之軍事地位，此爲政府所不能接受者。

在政府中佔有優勢之反動派與不安協的共黨之間，余必須聲明在二月間共產黨並無此種不安協之表示，已有一種問題：此即如何使和平安樂賜予飽受痛苦而目前被分階之中國人民是也，政府中之反動派顯然以爲不論其行動如何，必能獲得美國之幫助，共產黨則不願爲國家利益而妥協，彼等以爲經濟崩潰將使政府倒台，並深信沿鐵路交通的廣泛游擊戰，將加速政府之倒台，而將中國人民所受之痛苦，置諸不顧。據余觀察所及，此項情勢之挽救，惟有使政府中之自由份子與少數黨派担任領袖，少數黨派爲優秀人物之集合

，惟仍缺乏政治權力以實施控制之影響。余相信：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此等團體如能順利推行工作，必可經由良好之政府而達到團結之目標。事實上，國民大會業已制訂一項民主之憲法，其中主要部份均與去年一月各黨各派政治協商會議決定之原則相符合，不幸共產黨未能認爲可以參加此次之大會，而該會通過之憲法則似已包括彼等主要之要求在內。

中國政府不久即將進行重要之改組，而一四七年聖誕節前將可完成選舉然後實施憲法。目前民主中國之形式既已由新訂之憲法奠定，其實際步驟，自將成爲一種試煉矣。至於真誠歡迎各黨各派積極負政府責任，從事充實民主中國形式一點，政府確能做到何種程度則猶在未定之天

● 第一步將爲改組國府委員會與政府之行政部門，以待憲法之實施。實行改組之方法以及對自由份子與非國民黨黨員之代表席數，將有重大之關係，吾人並希望在此過渡時期內，共產黨或其他集團仍有機會得以參加政府，共同負起中國前途之責任。

國民黨治下之訓政時期已告結束，這點早已正式聲明在案，一黨之統治若真正終止，則國民黨即應終止收受政府之財政接濟。

余所言皆坦坦無諱，蓋非如此不能希望美國人民明瞭此複雜之問題。余在談判進行時期內已發表此種見解，余以爲大多數有關係之個人均已知之，余今公開發表，乃因此爲余之職責所在，向對於遠東局勢一切發展深切關心之美國人，提出余對於此種局勢及一切可能性之估計。